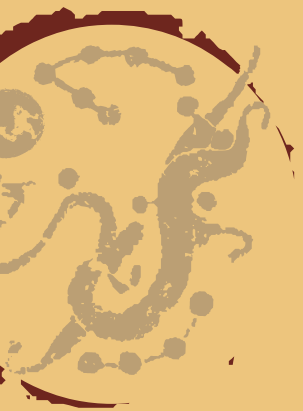




No. 3 2013

第二十七期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學術通訊

Newsletter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dvanced Humanistic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2013年8月，我院资料室获赠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 Martin Collcutt 教授的大批藏书，主要是日本史、亚洲宗教及艺术史领域的研究用书，计1120册。



2013年夏，美国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向我院资料室赠送吴讷孙教授、石锦教授的私人藏书680余册，涉及中国、日本研究、艺术与艺术史、宗教研究、社会经济史等领域。



目 录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向我院捐赠 Martin Collcutt 教授藏书	2
美国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向我院捐赠吴讷孙教授、石锦教授藏书	4
文史研究院“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与解题”项目启动	6
文史研究院小型学术研究会(第六十八场)	
沈丹森(Tansen Sen) 印度的中国研究和中印研究:现状与前景	8
“交错的文化史”研习班简报(第二十八至二十九期)	10
新书介绍 王庚武《更化:中国与新全球史》、韩森(Valerie Hansen)《丝绸之路新史》	12
外刊撷英	14
文史研究院“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招生方向 2014 年硕士生、博士生招生启事	18
文史研究院 2014 年博士后、访问学者招聘启事	20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纪事(2013.07—2013.09)	22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向我院捐赠 Martin Collcutt 教授藏书

2013 年初,我院资料室获赠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 Martin Collcutt 教授的大批藏书。在普大东亚系艾尔曼(Benjamin Elman)教授的大力协助下,这批图书于今年 8 月运抵上海,共计 40 箱,多达千余册,主要是日本史、亚洲宗教及艺术史领域的研究用书。

Martin Collcutt 教授是著名的日本史学者,1939 年生于英国,1962 年以优等(Honors)成绩毕业于剑桥大学,1975 年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论文题为《日本中世史与佛教》(*Medieval Japanese History and Buddhism*),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讲授日本思想史、文化史课程,并从事日本佛教史、日本中世社会经济、日中关系、日本与西方的交往等领域的研究。2013

年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荣休。

Collcutt 教授的主要著作有:《世界文化图册·日本卷》(*Japan: Cultural Atlas of the World*, Oxford, 1991)、*Bildatlas der Weltkulturen, Japan, Kunst, Geschichte und Lebensformen* (合著,Bechtermuenz Vlg., Augsburg, 2000)、*The Development of Sengoku Law*(Princeton),英译日本近代史家久米邦武(1839—1931)于 1872 年随“岩仓使节团”访美的记录《米欧回览实记》。在日本出版的著作包括:《周縁文化と身分制》(思文阁出版,2005 年)、《日本》(图说世界文化地理大百科,朝仓书店,2008)。编有纪念论文集《日本及其世界: Marius B. Jansen 和日本研究的国际化》(*Japan and Its Worlds: Marius B. Jansen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Japanese Studies*, 2007)。

此次获赠的 Martin Collcutt 教授的私人藏书,除少量日本文学作品外,涉及日本研究的书籍约占四成有余,主要是日本社会史、宗教史与日本艺术的研究,其中尤以西方学者关于日本社会史的英文论著为大宗,如《日本的宫廷与幕府》、《源氏与平家》、《江户的生活与习俗》、《日本:多面之邦》、《云端之上:现代日本贵



Martin Collcutt 教授部分著作



族文化的状态》、《日本传统的来源》、《日本转型：从德川时代到明治时代》、《坂本龙马与明治维新》、《东西方的日本》、《裕仁天皇：神话的背后》、《东京：形式与精神》等近 400 册。日本宗教、艺术领域的著作如《武士的宗教》、《中川桑园的禅宗之路》、《楸弓：日本萨满实践研究》、《日本的风俗画》、《织部与十六世纪的日本艺术》、《日本艺术的民间传统》、《艺术所见之春日崇拜》等 60 余册。

有关亚洲其他地域的宗教（佛教尤其是禅宗）、艺术与思想文化的研究，也有近三成。其中包括研究亚洲国家对外交涉的著作如《百济与大和：日朝早期的交

涉史》、《朝鲜的百济与大和日本的起源》、《儒家与德川时代的文化》、《前近代日本的国家与外交》、《前近代日本的排外主义与西学》等。此外，欧美史研究论著及文学、哲学书籍等约占三成。



我院获赠这批图书，补充了资料室原有藏书在欧美的日本研究、艺术研究方面的不足，使该领域的专业研究藏书更为齐备和周全，将为关注日本史、艺术史研究的师生提供极大的便利。为更好地方便研究者使用，资料室目前正在筹备设立 Martin Collcutt 文库，并安排图书的编目事宜，预计于年底之前正式向读者开放。□

美国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 向我院捐赠吴讷孙教授、石锦教授藏书

2013年夏,美国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向我院资料室赠送英、中、日文书籍680余册,涉及中国、日本研究、艺术与艺术史、宗教研究、社会经济史等领域。这批图书原属吴讷孙教授、石锦教授的私人藏书,其中吴教授的藏书约520册。

吴讷孙(Nelson Ikon Wu, 1919-2002)教授,祖籍福建,生于北京,是著名的中国艺术史学家和作家,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后于1945年负笈美国,进入耶鲁大学攻读美术史,1954年获博士学位。曾先后任西南联大助教、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教授、耶鲁大学教授。1965年起任教于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后任该校艺术及考古系主任,并于1971年参与创立亚洲艺术

学会(Asian Art Society)。1984年,吴教授荣获爱德华·莫林可德优异校教授(Edward Mallinckrodt Distinguished University Professor Emeritus)头衔,并以杰出特级终身教授头衔荣休。

吴讷孙教授出版有《中国图像艺术》(*The Chinese Pictorial Art: Its Format and Program*)、《中国与印度建筑》(*Chinese and Indian Architecture*)、《艺术中的精神贵族与正义》(*The Intellectual Aristocrat and Justice in Art*)等多种研究著作,为推动美国的亚洲艺术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曾获得古根海姆研究学者奖(Guggenheim Fellowship)、富布莱特研究学者奖(Fulbright Research Scholarship),1997年美国中西区华人





学术研讨会授予其“杰出学人奖”。为纪念他在推动和提升亚洲艺术研究上所作的贡献,1998年华盛顿大学和圣路易市博物馆专门设立了“吴讷孙艺文纪念讲座”。

除研究著述外,吴讷孙教授还是华人文坛中的知名作家(笔名“鹿桥”),出版有《人子》、《忏悔书》、《市尘居》等多部小说与散文集。其中完成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以西南联大生活为背景创作的长篇小说《未央歌》,在港台及海外华人文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未央歌》2008年首次在大陆出版,也深读者好评。



吴讷孙教授旧影

吴讷孙教授的这批藏书中,艺术史、东亚研究领域的英文著作达420余册,其中既包括亚洲不同地域艺术的研究主题,如《日本版画》、《日本卷轴画》、《朝鲜艺术》、《越南的艺术与考古》、《印度考古》、《巴基斯坦的犍陀罗艺术》、《公元七世纪以来波斯艺术概观》、《南洋艺术》、《西藏宗教艺术》等;也包括艺术理论方

面的著作,如《艺术中的形式感》、《艺术家与传统》、《艺术的历史》、《中国画的实质》、《东西方艺术的比较研究》、《原始艺术》、《形象与自我形象》等等。这批藏书,是由吴讷孙教授哲嗣捐赠给我院的。

此次获赠的另一部分图书来自台湾旅美学者石锦教授(James C. Shih)。石锦教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语言与文化系获得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和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文理学院,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的专家。出版的专著有《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太湖地区的个案研究,1368—1800》(*Chinese Rural Society in Transi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Lake Tai Area, 1368-1800*,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2);编著有《民国时代的国家与经济》(*State and Economy in Republican China: A Handbook for Scholar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0)等。石锦教授的这部分藏书中,含英文著作60余册,主要是二十世纪60、70年代欧美学界关于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成果。

我院与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文理学院有着多方面的学术合作与交流。此次获赠的这批藏书,是在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张晓东(Tony H. Chang)馆长倾力协助下促成的。这批图书极大地丰富了我院资料室在艺术史研究方面的馆藏,也为院内相关领域研究的展开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和便利。目前,相关图书编目、建库工作正在进程中。□

文史研究院“朝鲜通信使文献 选编与解题”项目启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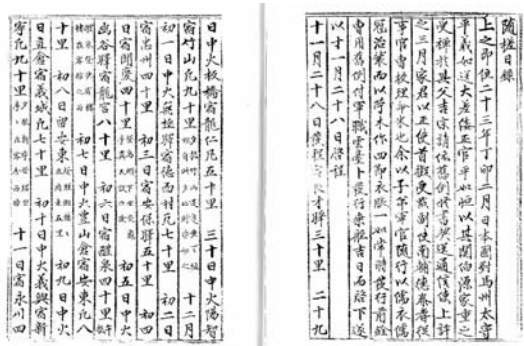
王鑫磊

文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文史研究院在“周边看中国”的学术方向下,致力于周边国家有关中国的汉文文献的整理与出版,继出版《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两套丛书之后,2013 年上半年又启动了“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与解题”项目,拟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出版一套集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于一体的朝鲜通信使文献丛书。

历史上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尤其是李氏朝鲜王朝建立的十五世纪之后,有关两者往来情况的文献记载开始系统地出现。从朝鲜王朝实录的记载来看,李朝朝鲜成立之初,就和日本有着密切的关系,双方往来甚为频繁,此后逐渐发展成一种规范化的国家间外交使节的往来,这些活动在朝鲜方面一般称为“通信使”,也有些时候称“回答使”、“刷还使”、“回礼使”、“修信使”、“体察使”等。

目前通信使相关的文献资料,以古籍善本的形式,保存在韩国、日本以及美国的一些图书收藏机构中,其中韩国(奎章阁和国立中央图书馆)保存最多,约七十余种。出版方面,最早的是 1914 年朝鲜古书刊行会出版的《海行总裁》四卷本,1977 年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



洪景海《随槎日记》

将该版本翻译成韩文,出版了十二册的国译本,并将原文附于书后,其中共收录了三十二种通信使文献。在日本,辛基秀、仲尾宏主编的《大系朝鲜通信使》(八卷本,1994 年出版),收录了二十九种通信使文献(其中有十一种为《海行总裁》未收),并收录了很多图像资料和研究论文。除此之外,首尔大学图书馆出版过五卷本的《通信使誊录》,其性质为有关通信使活动的官署文书。

我们为什么要出版通信使文献这一看似与研究中国无关的朝日关系史料?葛兆光教授曾多次提到这样一种观点:历史上朝鲜半岛和日本都受到中华文化的



深远影响,当朝鲜和日本产生接触时,随之发生的是两国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形成了一种“文化的比赛”的场面。评判谁的文化更优秀,需要有一个“标尺”,对当时的朝鲜和日本人来说,这个“标尺”就是中华,即谁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上做得更好。中华,或者说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缺位的裁判角色,可以说是一个“不在场的在场者”。

通信使文献,是朝鲜王朝派往日本的使行人员的记录,表面上看,它只是反映朝日关系的历史资料,与中国无关或者关系不大,但如果我们以“不在场的在场者”的角度去看,就会发现其中实际上包含了大量与中国有关的内容。然而,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说,纵观中国学界,有关通信使的研究仍是屈指可数,这不得不说

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正是基于这一状况,我们希望通过整理出版史料和集中推出一批研究论文的形式,引起大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就具体出版计划而言,我们在把握了通信使文献的整体状况后,一方面考虑文献产生时代的均衡性,一方面评估文献内容的详实性及与中国的相关度,两方面综合评估下,最终甄选出十九种文献,邀请专业相关的研究者对每一种文献进行录入、校对和注释,同时为每一种文献撰写解题。不仅如此,参与项目的研究者还将在整理和撰写解题的基础上,形成一批“朝鲜通信使专题”的专业研究论文,集结成册,与文献丛书同时出版。该计划预计在2015年完成。□

“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与解题”项目选定的文献目录

序号	篇名	作者	年代
1	日本行录	宋希璟	1420
2	海东诸国记	申叔舟	1443
3	日本往还日记	黄 慎	1596
4	海槎录	庆 暹	1607
5	扶桑录	李景稷	1617
6	东槎录	姜弘重	1624
7	丙子日本日记	任统	1636
8	癸未东槎日记	佚 名	1643
9	扶桑录	南龙翼	1655
10	东槎录	洪禹载	1682
11	金译士东槎日记	金指南	1682
12	东槎日记	任守幹	1711
13	海游录	申维翰	1718
14	奉使日本时闻见录	曹命采	1747
15	随槎日记	洪景海	1748
16	海槎日记	赵 曦	1763
17	乘槎录	元重举	1763
18	东槎录	柳相弼	1811
19	日东记游	金绮秀	1876

文史研究院小型学术研究会

(第六十八场)

印度的中国研究和中印研究:现状与前景

沈丹森(Tansen Sen) 纽约市立大学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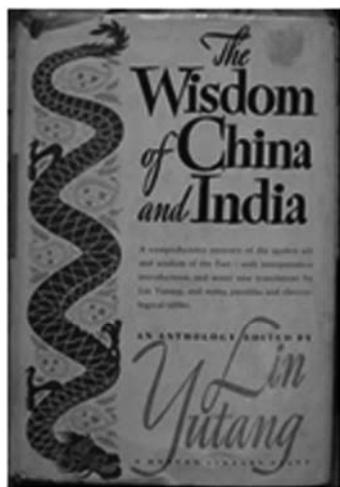
印度对中国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 1805 年在孟加拉兴起的汉语学习,这与当时传教士的活动和殖民统治计划有着密切关联。为满足这一学习需求,1910 年加尔加答大学开设了汉语及文学课程,1925 年,国际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1937 年,在国民党的资助下,谭云山先生在国际大学设立了中国学院。此后,德里大学和尼赫鲁大学也相继开展起中国研究。但随后的二十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尽管有福特基金支持的研究项目,但学者对中国研究的热情逐渐消退,直到进入 80 年代后新的研究中心得以开设,但总体的教学研究水平仍低于国际学界标准。



泰戈尔创办的中国学院

目前印度学界关于中国研究的现状并不很乐观,问题主要来自三方面:其一是 1962 年的中印冲突直接导致了中国学院的衰落,致使中印双方学者的交流陷入停滞状态。其二是印度高等教育体制和架构问题;印度高等教育体制对课程设置有十分严格的限制,学者几乎没有机会从事跨学科研究。其三是缺少印度政府和商业团体的支持。因此,印度的中国研究现状较为惨淡,绝大多数印度人对中国了解甚少,于是媒体利用歪曲事实或片面的新闻报道对民众认识进行决定性的操控,而这最终导致了中印关系的紧张。

接下来探讨的问题是中印研究。首先,需要厘清中印研究这一概念,中印研究主要包括对中印两国交流及其关系的历史及现状的研究和中印两国的对比研究,基本研究方法是充分利用两国数据资源进行分析对比。研究关注点有四类:(一)关注二十世纪前的中印往来,集中于研究佛教传播;(二)在地区和全球语境下,关注中印双方矛盾及为恢复友好关系所做的努力;(三)关注中印两国崛起及其全球影响,主要着眼于经济和政治生态方面的影响;以及(四)致力于传播“中印大同”(Chindia)理念的研究。



林语堂 *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

中印研究大体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自1900至1930年在泛亚语境中诞生,到1930至1960年中印交流往来的多层面研究,再到1960年至80年代期间对中印冲突及边界问题的研究,而后至今转向对经济、战略、国际政治生态、竞争关系及“中印大同”的关注。第一阶段的泛亚时期,中印曾被视作一体,即出现了“中印大同”理念的雏形。期间出现的著名学者和政治家有梁启超、泰戈尔、沙畹、陈寅恪和 Benoy Kumar Sarkar 等,以研究佛教交流为主。此外,康有为和 Sarkar 的游记中也有大量对中印宗教文化交流的思考。1930至1960年是抗日和后殖民时期,这一时期学者在泛亚时期取得的成果基础上继续开展研究,代表学者有谭云山、尼赫鲁和戴季陶。随后出现了中印研究这一学术

领域,代表学者有西勒万·列维、季羨林、林语堂、金克木等,学术期刊《中印研究》也正式创刊。这一时期出现了涉及中印交流中除佛教以外的其他方面的研究著作,主要有伯希和与冯承钧的作品。此后1960年至80年代中印冲突期间出现了研究军事冲突和边界问题的著作,还出现了讨论西藏问题的作品,代表学者为阿拉斯太尔·兰姆。此外还有中印政府间交换文件和两国早期往来的研究作品,比如季羨林、黄心川和梅维恒的著述。至此之后转向对全球经济和政治生态问题的关注,包括中印两国崛起的意义、两国间持续的竞争等。其中也有刘欣如、船山微、王邦伟、陈金华、Daniel Boucher 等学者重新审视中印早期往来史,还有回归泛亚研究时期对“中印大同”的研究,其代表学者有 Jairam Ramesh 及 Tagore-Tan 的研究团队。

尽管历时一百多年,中印研究在学界仍未成大气候。不少研究,特别是近年来的研究,通常存在方法论上的问题,且没有平衡地处理研究对象。中印研究作为学术领域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合理的理论建构和明确的方法论指导。也应当开设更多的博士生项目传授这些研究方法,以便在研究生阶段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学术训练。(陈宁阳 摘译)□

“交错的文化史”研习班简报

(第二十八至二十九期)

2013年5月22日下午,“交错的文化史”工作室举办第二十八次研习班,邓菲副研究员报告了新近的研究课题《图像的复古与再造——谈宋金墓葬中的孝子故事图》。该研究从宋金时期墓葬中的“孝子图”入手,通过对这一类图像题材的分析,考察视觉资料的复古与再利用,并探讨北宋中后期以来的文化、宗教、政治等方面的发展与变化。

首先,报告人梳理了目前可见的考古材料,提出关于孝行、孝子的各种视觉表现形式始于汉代,经后世不断的增删演变,到宋金时期形成比较固定的“二十四孝”。宋金时期是孝子故事文本与图像发展的关键时段。这些图像不仅有非常多样的表现形式,而且在东亚地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辐射面较广。因此,在探讨该图像题材的发展与传播时,既需要注意时间的纵向联系,同时还需要考虑到不同地域、国家、文化上的横向关联。

第二部分主要集中于丧葬环境中的孝行图。由于孝子图在墓葬传统中早有先例,可以回溯到北魏甚至东汉,所以报告人提出了“图像复古”的思考角度。“复古”是艺术史研究中相当重要的主题,对过去风格的复原和再次利用,在各个时期的视觉文化中都有丰富的表现形式,其中墓葬美术的复古也是一个值得思

考的题目。报告通过比较汉代武梁祠线刻、纳尔逊博物馆北魏孝子石棺、河南洛阳关林庙宋代砖雕,提出宋金时期的孝子图在形式上有了明显的变化:通常为多幅成组出现,构图上也表现出叙事情节的减弱;图像位置也非常特殊,一般不作为墓室装饰的主体,多位于斗拱拱间和墓顶等位置。这些形式方面的特征都提示出孝子图像意义和内涵的改变。

报告的第三部分接着讨论了孝子文献的流变以及图像与文本的关系,通过对董永行孝故事的文字叙述与视觉呈现的分析,提出“孝感神迹”为六朝以来孝悌故事所传达的重要信息。许多孝行故事都强调了孝行的神秘性,即“孝悌之至,通于神明”的观念。“孝感”的主题自六朝至唐宋一直不断地被重复叙述,当时的人们很可能将孝道视为人神相通的重要法则,即至孝通灵。宋金时期孝子故事的构图与刻画也都与文本中强调“孝感神迹”相呼应。孝子图的整体性弱化了故事的细节,凸显出孝子们作为一个集合所具有的共同内涵,这些图像在墓葬中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功用。唐宋以来宗教观念的介入是促使孝行逐渐具有该内涵的关键因素,而这一点很可能是宋金时期孝子图像进入墓葬系统最为直接的推动力。



最后,报告人提出宋金墓葬中孝子图的形式、意义,与汉魏时期的前例相比,都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从教化、典范功能演变为通于神明、引导和辅助墓主人升仙的特殊内涵。在这个意义上,孝子题材的回归并没有复制过去的设计,而其实是借用过去的题材,进行了文化的再生与创新。

另外,如果结合墓葬中其它的图像题材,可以发现,不仅仅是“孝子图”单个题材的再次利用,妇人启门、墓主画像、宴饮、庖厨、娱乐等许多与东汉时期丧葬艺术相关的题材,都在宋金时期的墓葬环境中再度流行。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些现象?宋金墓葬与汉墓图像内容之间的联系,是否可以放在北宋中后期复古、古物研究的脉络之下进行思考?在官方与精英阶层复古风潮的影响下,民间的墓葬是不是也有意识地复兴过去,利用并再造图像题材?这些都是值得未来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2013年9月25日下午的第二十九次研习班上,董少新研究员报告题为《明清鼎革之际的澳门》的研究。澳门历史上曾先后经历了明清鼎革、清初迁海、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的19世纪下半叶的中西冲突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又经历了清朝覆灭、民国建立、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及共和国建立、葡萄牙康乃馨革命等一系列中外重大政治、军事事件,但澳门度过了每一次动荡和危机,得以延续和保存了四个半世纪。

17世纪中叶中国发生的明清鼎革,对澳门造成了严重影响:贸易萎缩,社会动荡不安,更为严重的是,曾大力支持南明政权的澳门,在清军占领广州后,面临着被攻取的危险。报告重新系统梳理葡文、中文和荷兰文相关文献,通过阐述澳门与南明政权之关系、澳门投诚清朝之过程等问题,呈现澳门如何渡过明清鼎革的危机,并归纳其背后的历史原因。

第一,葡人居澳最主要的目的是贸易,他们有居留权而对澳门无主权,他们对中国王朝亦无政治认同。为了获得贸易权利和在澳门的居留权,葡人必须与澳门主权的所有者中国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而不必理会中国的统治者是谁。从这个角度而言,澳门葡人对南明诸朝的援助,并非政治效忠的行为,而只是因为当

时南明仍保有对包括澳门在内的南方诸省的控制权,而一旦南明失去了对广东的控制,居澳葡人便立即倒向清朝,而不必背负任何政治忠诚的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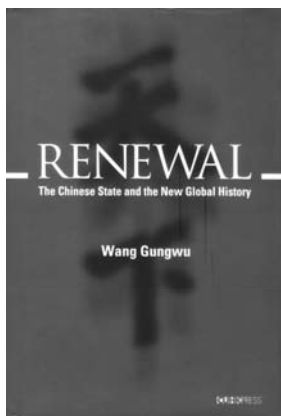
南明朝廷颁发给耶稣会的敕旨

第二,如明朝一样,清朝亦需要葡人居留澳门,开展中外贸易,以获得域外商品,并抽取利税。明清政府允许葡人居住澳门贸易,是基于两个条件:首先,中国需要葡人经营中外贸易,其次居澳葡人完全可以被政府掌控,不至于对中国构成威胁。清军攻陷广州后,以其军事实力,若要攻取澳门,应不会太难,但清朝并无此意,相反希望招抚葡人,只要他们能表示归顺之意,即允许其继续留在澳门经营中外贸易。清政府也认识到,居澳葡人对清朝统治完全不足以构成威胁。但清朝对荷兰则更为警惕,尤其是当时荷兰与郑氏政权关系密切,因此拒绝了荷兰通商的请求。

第三,澳门葡人与耶稣会关系甚密,有着共同的利益。澳门得以渡过明清鼎革之际的危机,亦有赖于来华耶稣会士的鼎力相助。澳门对南明的援助,即是通过毕方济、瞿纱微等耶稣会士,尽管在南明后期,澳门与耶稣会在是否继续向其提供援助的问题上产生分歧,但考虑到当时汤若望已在北京通过效力清朝而站稳脚跟,则耶稣会对南明的支持,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在卜弥格陷入孤立困境之时,耶稣会上层并未给予其更多的支持,卜弥格的悲剧或许正在于此。而当澳门面临荷兰东印度公司新的威胁时,汤若望等在京耶稣会士施巧计为澳门化解危机,显示出来华耶稣会士与澳门葡人一致的立场。□

新 书 介 绍

- 王庚武《更化：中国与新全球史》(*Renewal: The Chinese State and the New Global History*)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国家观念逐渐由传统帝国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即寻求一种现代认同,对国家治理体制进行重新设计,并重新书写自身的历史。这种更化(renewal)的努力,在中国人挣扎着重建国家的百年历程中贯穿始终。其中一

部分内容,便是调和中国本土的固有观念与受到欧洲史学传统影响的新观念。

中国的“天下”观自古以来根深蒂固,而近代中国却不得不在强调自身历史的完整性,与接受欧洲中心的世界史观之间作出艰难抉择。晚清以来,中国的社会、政治变化,往往被套用欧洲史的术语来进行衡量。中国的历史学家也被鼓励使用近代概念来重新阐释本国历史,直至把“帝国”(empire)、“民族/国家”(nation)等外来词汇强加于中国史的各个历史阶段,中国的本土词汇如“中国”和“天下”,由于缺乏明确定义而无法沿用。

在这种中外学术术语的错位中,应如何看待世界史?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西方史家虽曾有过抛开欧洲中心主义的尝试,但仍未能将中国史较好地纳入新的世界史中。他们尽管也希望写出不带任何中心色彩、民族偏见与地域偏见的世界史,不过直至今日,这类历史往往写得松散、零碎、说教而缺乏生气,无法广泛地吸引读者。另一方面,当代的世界史著作又常常“倒序”式地看待历史上的部落和城邦,描述其如何相继演变成王国、帝国与民族国家。其主流观点认为,主权/民族国家制度是未来世界安全与和平之基石。尽管这一论点还包含着一些假定,但对于希望建立稳定世界秩序的人来说,这样的历史书写无疑是极易接受的。

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中国”的涵义是什么?中国人自身如何理解历史上的“中国”,其他国家和民族谈及“中国”时,涵义又是什么?中国人向来重视稳固的中心,“中国”(中央之国)的观念意味着政治上的秩序性,同时它又是道德权威的来源。不少中国思想家认为,中国一直扮演着开化世界的角色。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在当下的世界也能有所作为?

每个国家的历史都有其本源,没有一个国家能抛开历史而仅从近代出发。中国有着自身的历史文化,这当然也成为当代中国的重要社会资本——中国人也依然重视自身的历史。中国历史上关于帝国与中心的记载并没有消亡,甚至到现在依然还影响着居住在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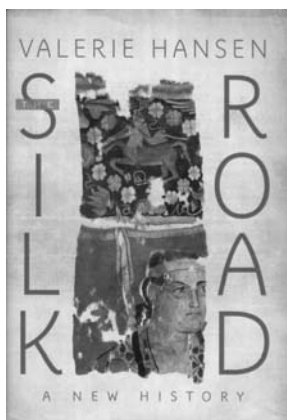


疆的非汉族族群。中国史家依然可以从过去的历史中获取足够的资源,来影响未来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

在本书中,作者作为出身于特殊族群的中国人,从一个“他者”的角度来思考中国的国家观念,观察中国如何自我形塑为现代文明国家,如何处理两千年来来的中华帝国遗产与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关系,又如何通过接受近代化的洗礼来复兴自身特有的文化传统。

全书分为五章:“世界史中的中国”、“另一种民族:并不绝对的主权关系”、“新使命下的革命”、“现代化、国家与文明”以及附录“天下:来自中国之外的观点”。(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

● 韩森 (Valerie Hansen) 《丝绸之路新史》 (*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



该书作者基于目前所知的公元二、三世纪及十一世纪早期的相关中西文献,以及新近在敦煌、于阗地区考古发现的文献材料,分七章讲述丝绸之路上的不同遗址——包括中国西北的尼雅、龟兹、吐鲁番、敦煌、于阗、长安(今陕西西安)

以及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描述的不仅仅是丝绸之路上的交通和贸易,也是通过沿路上一个个遗迹的考古发现,为我们展现丝路上商人、使者、圣徒、旅客之间的宗教、文化、技术的交流和融汇。

第一章从尼雅和楼兰开始。有大量的文献证据证实当地有文化交流的存在,来自犍陀罗地区(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移民带来了他们的文字系统及在木板上书写文字的习惯;他们可能是最早进入西方的佛教徒之一。龟兹是第二章的主题。龟兹文献引发了一个令语言学家争论长达一个世纪的问题:为什么居住在中国西部的人们所讲的印欧语跟该地区的其它语言存在差异?

粟特人是中国在丝路贸易上最重要的外国人群体。许多粟特人就长期定居在丝路北道的吐鲁番——即第三章中所讨论的遗迹。在那里他们从事多种不同的职业,包括农业、旅馆、兽医和贸易。第四章重点讨论粟特人的故乡撒马尔罕。随着中国第一个黄金时期的衰退,尤其是712年撒马尔罕落入穆斯林之手以后,中国变得日益排外,不再欢迎大批的外国人来华。第五章讨论的是近年来在唐代首都长安(今西安)出土的外国人墓葬。尽管大部分粟特人信奉祆教,但六世纪末七世纪初居住在长安的少数粟特人却选择了中国式的葬礼,与伊朗世界相比,他们的墓葬描绘了更多关于死后世界的细节。

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约4万件文献,是世界上最为惊人的宝藏,其中包括了世界上最早的雕版印刷书籍《金刚经》,这些是第六章讨论的内容。作为寺院的储藏室,藏经洞还藏有大量的非佛教文书——很多其它类型的文书被作为副本抄写在佛教文书的背面。敦煌大量的石窟壁画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也是其它佛教遗迹所不及的。尽管敦煌地区创造了如此杰出的艺术精品,在八世纪中叶中国军队撤出之后,却又回复到实物(如粮食、布匹)交易的状态。

于阗地区和敦煌的统治者一直有着密切的往来,这是第七章讨论的主题。于阗位于丝绸之路南道上的尼雅以西,十一世纪初年的外族入侵后,于阗改信伊斯兰教。本章还考察了伊斯兰教到来之前该地区的贸易和历史。

作者指出,丝绸之路不是连续单一的道路,而是一连串中西之间的贸易市场。中国和罗马帝国几乎没有直接的贸易往来,中国的合作伙伴是今天的伊朗人——他们留在中国的墓葬体现了他们的祆教信仰。同时,丝绸并不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货物,而中国人在凯撒大帝诞生之前所发明的纸张,对欧洲产生了更为巨大的影响。不仅如此,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丝绸之路上思想、技术和艺术样式的传递。丝绸之路是一系列激动人心的故事,也是一段段引人入胜的文化交流史话,更是贯穿中亚和东南亚的文化动脉。(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庄程恒)□

外刊撷英

二宫文子:《蒙古与德里苏丹国之间:13世纪南亚北方地区哈刺鲁的盛衰》(モンゴルとデリーの間で:13世紀南アジア北邊地域におけるカルルグ家の興亡),《东方学报》第87册,2012年12月

以1218年的讹答剌事变为开端,蒙古大军逐渐席卷了中亚和西亚。追击花刺子模末代王子札兰丁至南亚北方地区,势力范围扩展到阿富汗地区的蒙古军,不断进犯德里苏丹支配下的印度河流域。此后一个世纪,摇摆于两大帝国之间、政权半独立的小集团开始活跃于历史舞台。本文主要关注小集团的一支——哈刺鲁,并探讨南亚北方地区小集团势力变迁、蒙古军对小集团采取的军事行动及小集团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通过研究哈刺鲁的历史,可了解蒙古如何统治小集团,以及地理环境对南亚北方地区小集团的活动所产生的影响。

哈刺鲁活跃于1220年代至1260年代后半叶。1221年哈刺鲁第一任首领塞甫丁(Sayf al-Dīn Hasan Qarlūg)与花刺子模札兰丁联合对抗蒙军。从塞甫丁被称为“苏丹的同盟者”而非“臣下”来看,哈刺鲁极有可能是独立政权,但这种同盟关系仅维持一时。

哈刺鲁通常将据点设在“伽色尼—木尔坦”沿线,特别是伽色尼到印度河平原邦努一线及其周边地区,此为哈刺鲁势力范围的一大特征。哈刺鲁所处的河中地区正是蒙军大本营前往印度防卫的最前线——木尔坦和拉合尔二城的必经之地,对蒙古来说具有重要的

军事意义,因此蒙古以派遣达鲁花赤的形式控制着哈刺鲁及其周边势力。

1260年前后,继承首领之位的塞甫丁之子纳西尔丁·默罕默德(Nāsir al-Dīn Muhammad)欲与德里的吉亚斯丁·巴勒班(Ghiyāth al-Dīn Balban)苏丹联姻。德里宫廷派遣使节前往哈刺鲁商议此事,因巴勒班的达鲁花赤泄露消息,半路被截下送往伊尔汗国。由此可见设立达鲁花赤、附属于蒙古的小集团,其外交受到的严格限制。此时哈刺鲁对蒙古而言已成为河中地区的不安定因素。随后,半独立政权赫拉特首领赡思丁为扫除其向南部岩岭及信德地区扩张的障碍而诬陷纳西尔丁,后者被旭烈兀汗召至宫中处以死刑。从此,哈刺鲁退出历史舞台。

和田昌史:《后蒙元时代的海洋情报:以16世纪前半叶葡萄牙地图和海事书为中心》(ポスト・モンゴル時代の海洋インテリジェンス:16世紀前半ポルトガルの地図と海事書をめぐって),《东洋史研究》第71卷3号,2012年12月

随着蒙元帝国的瓦解崩毁,欧洲与亚洲的三条主要贸易线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早在13世纪,战争的冲击使得经由中亚波斯湾、巴格达、叙利亚的“中央线”急速衰落。随着黑死病的传播,由拜占庭帝国经营的北方陆路也随之走下历史舞台。与此同时,经由



红海、印度洋通往东方的南方海路却逐渐繁荣,成为了东西交流的主要路线。

在这条新兴的航路上,葡萄牙取得了霸权。为了保证贸易的顺利进行,对于红海、印度洋、南海的情报搜集至关重要。16至17世纪,葡萄牙人编成了一系列关于这些海域的海事书和地图,记载了航海技术、星图、地理位置、针路、季风、海流、暗礁等等情报。其中,以他们编成的各种“波托兰(portolano)”海图对后世地图史的影响最为巨大。波托兰海图的绘制分为两派,其中意大利派注重于海岸线描写的精度,而卡塔卢尼亚派则力图在地域覆盖的广度上有所突破。这种地图的绘制背后,隐藏着葡萄牙在地缘政治上的目的。结合当时葡、西在开拓世界上争先较劲的历史背景来看,绘制波托兰海图宣示着天主教的葡萄牙对从西非到印度的广袤海域的所有权。1504年由佩德罗·雷尼尔(Pedro Reinel)绘制的海图对于经线、纬线的标注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同时这份地图对北极星高度的标注体现了天文仪器“板”的应用,并且能够与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中记载的郑和下西洋行迹进行对照。

1509年以后,随着葡萄牙将目光放到中国和香料群岛之上,关于东亚、东南亚的情报搜集逐渐变得重要,由此产生了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Francisco Rodrigues)的海事书和《东方诸国记》。其书沿袭了波托兰海图的成果,反映出葡萄牙对于南海、东南亚的战略意图。书中表现出对中国的强烈关心,记载了1513年葡萄牙人从广州带回的情报。这本书也最早用欧洲语言粗略地描述了到广州的航路,记载了西沙、南沙、台湾等岛屿。

小泽实:《蒙古帝国时期以后欧洲与亚欧腹地的交涉》(モンゴル帝国期以降のヨーロッパとユーラシア世界との交渉),《东洋史研究》第71卷3号,2012年12月

欧洲基督教文明在其发展历程中,一直不断受到亚欧腹地的其它宗教文明(如伊斯兰教)的影响。尤其是13世纪以后蒙古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相继出现,更是给欧洲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文章回顾了学界关于蒙古帝国出现后欧洲与亚欧腹地关系的研究,大致总

结为五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蒙古的西征,一方面使欧洲陷入恐慌;另一方面,也使得欧洲人对于欧亚腹地的未知世界产生了更高的关注。第二种观点认为,在不同文化圈之间的交流中,交流媒介不可或缺。因此,对诸如当时出现的外语词典的研究应该更加重视。第三种观点认为,随着蒙古与欧洲交往的加深,欧洲人对于亚洲的想象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如约翰长老传说及《马可波罗游记》等就是明证。第四种观点认为,正是由于蒙古帝国及奥斯曼帝国等异文化帝国对欧洲文明所产生的压迫感,促使“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欧洲”这样的意识逐渐觉醒。第五种观点认为,在欧亚交流史上,对东正教国家如拜占庭帝国晚期历史的研究一直被忽视。对此应当予以重视。此外,作为东正教国家的俄国与蒙古的关系,也有必要进行重新思考。

蒙古帝国时代以后,欧亚之间的交流与碰撞,对双方的历史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者认为,无论是对欧亚交流史还是对欧洲中世纪史的研究,都有必要将之置于不同文明之间交流的广阔视野中来考察。

Ad Dudink(杜鼎克):《卢安德寄往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中文书籍》(The Chinese Books, Sent by Andrzej Rudomina S. J., in the Japonica-Sinica Collection of the Roman Archives of the Jesuits), *Monumenta Serica*《华裔学志》,Vol. LX, 2012

文章从卢安德1627年7月31日写往立陶宛耶稣会省的一封信入手,除了对信的内容进行考辨外,也根据信件日期,结合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文献阐幽抉微。有人认为卢安德于1626年到达澳门,并随即赶往福州协助艾儒略。然而本文作者认为,卢安德去福州的时间应为1628年年末。

在这封信中,卢安德提到随信附有几本中文著作。而在此之前,刊印于1610年的庞迪我著作《庞子遗论》已被寄往立陶宛,作者认为该书也极有可能是卢安德所寄。然而,卢安德1627年所寄的这些书并未存放于立陶宛,甚至并未到达该处。很有可能的是,在1676年以前,这些书便被径直移到罗马耶稣会档案馆。

根据1676年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一份书目,该年



馆藏的中文著作包括高一志的《教要解略》，庞迪我的《七克》、《庞子遗论》、《天主实义续编》，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交友论》，徐光启和毕方济的《灵言蠡勺》以及艾儒略的《职方外纪》等。这些著作大多未附有笔记，但高一志的《天主教要记略》例外。通过比对该书的字迹与1627年的信件，作者认定该文字的作者为卢安德。通过同样的方法以及进一步的考辨，作者认为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也是卢安德从杭州所寄。加上卢安德在1627年信中所提到的《庞子遗论》，这些书中至少有两至三种为卢安德1627年从杭州寄往欧洲，并最终辗转存留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

Stanislav Južnič:《圣彼得堡与北京天文台之间的一座桥梁：斯洛文尼亚的耶稣会士刘松龄(1703—1774)研究》(*Building a Bridge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of Petersburg and Beijing: A Study on the Jesuit Avguštin Hallerstein from Present-day Slovenia, Celebrating the 310th Anniversary of His Birth*), *Monumenta Serica*《华裔学志》, Vol. LX, 2012

本文是耶稣会士刘松龄的小传，文中另一重要人物为晚其约四旬的同胞兼会友 Gabriel Gruber。刘松龄出身于贵族家庭，从小受到耶稣会的系统训练，精于数学和天文。他和 Gruber 的出生地位于现在的斯洛文尼亚，二人都曾在中西科技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长期以来关于他们的事迹一直隐而不彰。

作者讨论了刘松龄的家庭、早期的学习以及启程去东方的过程。接着论述了刘松龄在中国的各种合作对象，包括葡萄牙耶稣会士、法国耶稣会士、汉满蒙各族的合作者，以及与朝鲜科学家的交往，并全方位考察了刘松龄在中国尤其是北京地区的活动事迹。接下来作者讨论了刘松龄寄往欧洲的信件，包括家书和寄往维也纳的公事信件，然后将论述重心转向他和圣彼得堡两位俄国物理学家的联系，以及与圣彼得堡其他学人的联络等方面。在北京，刘松龄主持了一次电学实验。此外，他的学术兴趣还延伸至生物学方面。

刘松龄和 Gruber 皆在中西方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他们都以科技作为传播基督教信仰的工具，并各自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促进了科学知识在中国和俄国

的传播。尽管他们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家，也并非间谍，但其传回西方的关于东方国家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西方之于东方优势的形成。

Dinah Jung:《沉香的文化史：东亚及亚洲邻国的香料》(*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Agarwood: Perfumery in Eastern Asia and the Asian Neighborhood*),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3, No. 1, 2013. 1

沉香，往往容易让人联想到其神秘产生过程的种种传奇。沉香的文化史至今仍未有人阐明，故而本文先讨论各地的沉香交易，进而勾勒出亚洲香料工艺的生产和交流的历史，并最终描绘出沉香的整体文化史。

第一部分界定了沉香的自然属性和文化属性。沉香是沉香木受伤以后树脂结成的疤。作者指出这种产生的过程，与亚洲思想中人类自身精神的成熟过程相同。第二部分描绘出了3至8世纪香料在中国的历史。汉武帝时已引进了不少外国香料，汉墓中的《汉宫香方》便可为证。佛教的东传与香料的引进关系密切，因为熏香是佛教仪式和冥想实践的一部分。至唐代，沉香的使用更加普遍。其时的广东地区，俨然已是国际香料市场的中心，制造和品鉴香料也已具高超的水平。文人和统治阶层，在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诗词也藉藉提及。考古材料如香料钟盘、香料印章和香囊等等也可作为辅证。

第三部分考察了跨区域的交往、文人团体和高级香料之间的关系。这部分的讨论涉及宋代的文化和经济的繁荣，宫廷品香专家丁谓及其作品《天香传》，其它作家如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的记录。在第四部分，作者指出日本“香道”是源于中国禅宗的思想。日人践习香道，是为提高觉悟和改善人格。同样的仪式，中国人则称为“香品”，也颇流行。第五部分考察了香道的当代命运，明治维新后逐渐式微的香道在当代又重新流行起来。香料的使用者热衷于从香料文化中创造新的文化认同。

沉香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内容涉及制作和使用的工艺、艺术和美感。人类如何利用和估价自然并将其商业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亚洲多元文化的语境下寻求自身身份认同的故事。



Nathalie Bazin:《藏传佛教艺术中的香供》(Fragrant Ritual Offerings in the Art of Tibetan Buddhism),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3, No. 1, 2013. 1

在藏密的主要仪式中,五感的供奉所针对的上师和神灵各有不同。这些感觉被拟人化为五位女神。香(gandha)是嗅觉的女神 Gandhā 的人格化。她的皮肤有不同色彩,标志则是一个盛满香水的贝壳。Dhūpā 是香味的拟人化,其标志是香炉和深色皮肤。她们出现的时候,有时一头二臂,有时则三头六臂。这样的例子见于 11 世纪阿尔齐(Alchi)寺院以及皮央(Phiyiwang)石窟的曼荼罗壁画上。吉美博物馆所藏的一件 14 世纪的宗教卷轴画唐卡上也有这两位女神的组合。她们还出现在塔布(Tabo)寺的立体曼荼罗之中。

在唐卡的画面上,嗅觉通过一个装满香或香水的白色贝壳来表现。它们被画成水平状,有时会象征味觉的水果摆在一起,也会和象征听觉的乐器放在一起。在佛教里,贝壳里通常装着浸泡有藏红花的水,也有的香水包含五种物质:藏红花、檀香、麝香、樟脑和肉豆蔻。藏香主要取自杜松叶粉,通常在香炉里燃烧。它的香味被认为有助于宗教冥想。杜松作为供品在山顶点燃,以获得神灵的 protection。传统藏香的主要原料是杜松粉末拌上各种草药、藏红花、檀香、沉香和麝香,但实际上许多香的配料超过了三十种。进香时,要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香柱,其他三根手指则要伸直,这表示一种特殊的手印。如果是在密宗仪式里,这时还要念咒。

藏传佛教艺术中有一些不同式样的金属香炉。最漂亮的香炉制造于西藏东部德格(Derge)地区,吉美博物馆收藏了一件,制作时间在 16 或 17 世纪。它是铁制镀金,镶嵌青金石、绿松石、水晶,镂雕涡旋、鹿、龙的装饰图案。这种题材的风格受到汉地的很大影响。吉美博物馆还收藏一对华盖形状、带链子的铜制香炉,时间在 19 世纪。在一件 13、14 世纪的唐卡底部,一位圣僧手持一根当时流行的球形香炉上的链子,样子使人想到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几个唐代香囊。同一时期的一些唐卡画面上,僧人的面前则横放着贝壳。塔形香炉里也可点燃杜松枝叶,仪式用的花瓶则要配上一根用来洒水的孔雀羽毛才算完整,瓶身上常常装饰着象征吉祥如意的莲花瓣。

综而言之,西藏佛教的“后弘期”开始于 10 世纪末,这一时期藏传佛教艺术中的某些图像题材和表现对象证明了香供的重要性。

In-Sung Kim Han:《器物的历史:中世韩国的伊斯兰物质文化》(Object As History: Islamic Material Culture in Medieval Korea), *Oriental Art*, Vol. 44, No. 3, 2013. 4

本文关注的是高丽王朝后期至李氏朝鲜时期的装饰艺术。

1985 年中国广州清真先贤古墓附近出土一方高丽穆斯林刺马丹墓碑,碑文不仅证实穆斯林对蒙古帝国的影响,也体现了韩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某种关联。纵观伊斯兰教在韩国的发展史,从九世纪新罗王朝时期二者在文化与商业上的早期交往,历经穆斯林势力影响尤为显著的高丽王朝后期,再到 1427 年李氏朝鲜实行同化政策。从那时起伊斯兰教就被迫融入了朝鲜半岛的社会主流,渐渐从历史文本中销声匿迹。然而通过研究现存物质文化不难发现,伊斯兰文化给中世韩国的装饰艺术烙上了深刻的印记。

在器物装饰方面,高丽王朝后期的手工艺品呈现出与传统西亚特色相类似、用全身纹样装饰器物的趋势,叶状纹样被广泛运用于铜及镶嵌青瓷制品。然而不同于伊斯兰艺术中抽象的植物纹样,高丽器物往往采用牡丹纹、菊纹等更为写实的植物纹样,也有采用阿拉伯式涡卷线状图案的少数特例。在建筑装饰方面,花草纹样装饰的应用,以及元大都的宫殿和宫城设计,亦吸收了伊斯兰文化的建筑装饰风格,体现了元朝和高丽上层社会在文化与艺术方面的融合。

另一重要依据是器物形制。高丽器物的两个形制——长颈瓶(日本学者称为“鹤颈瓶”)和锤形瓶,便是从伊斯兰世界传入。盛行于高丽的卧足收口铜制深碗即典型的伊斯兰形制,与锤形瓶一样,经由辽代灭亡之后融入高丽的契丹人传入。此碗的盛行与中世韩国伊斯兰教为迎合王室举行尊王仪式的需求有关。另外,发掘于朝鲜半岛南部一只高丽时期的“龙碗”,兼具传统伊斯兰文化元素与东亚装饰的特征。□

陈铮、姚达兑、孟明铭、王皓、韦梦夏、朱海晶 摘译

文史研究院“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招生方向

2014 年硕士生、博士生招生启事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立于 2007 年 3 月,是教育部指定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致力沟通文、史、哲不同学科的交流与融合,推动世界视野中的中国研究,并努力推动各种新文献和新资料的整理。

文史研究院的五个研究方向为:“从周边看中国”、“交错的文化史”、“批判的理解国际中国学”、“域外所藏有关中国的图像资料”及“中国思想、宗教与艺术史的综合研究”。目前,已拥有来自海内外的一批高学历、高素质的研究人员,分别从事宗教、艺术、思想、历史等领域的研究。研究院还设有博士后工作站,招收思想史、文化史、艺术史等方向的博士后研究人员。

“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是由复旦大学研究生院批准、文史研究院主持,并得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支持的硕士、博士招生项目。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关于“亚洲”或者“东亚”的研究逐渐发展,许多著名大学越来越趋向不再区分中国研究、朝鲜研究、日本研究、伊朗研究或印度研究,而是进行交叉的或综合的“东亚”或“亚洲”研究,同时,原

来严格的学科界限,如历史、文学、哲学也在逐渐淡化,传统的“中国研究”也由于“从周边看中国”的理念而扩大了研究视野。因此,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支持下,于 2011 年起开设“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博士方向,并于 2013 年起招收此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以培养专业基础更扎实、连贯性较强的亚洲研究方向的学生。这一项目兼收国外与国内的学生(国外研究生需要首先通过汉语等级考试),培养具有对亚洲历史与文化有综合知识,可以从事多方面亚洲研究的人才。并且逐渐使研究生具有广阔的研究视野、较好的语言和文献能力、明确的问题意识,对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宗教、艺术和历史有较专门的知识。

文史研究院拥有多名可以用中英文双语教学,研究范围自西亚、中亚、印度到中国、韩国和日本,研究领域从艺术、宗教到历史的学者,并且有来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日本东京大学的教授参与教学。

项目的基本课程包括“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亚洲物质文化与艺术史”、“亚洲诸国的历史、宗教与思想”、“有关亚洲的文献概



述”、“国外亚洲与中国学的研究”等。

目前,“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博士方向有导师四人,分别为:葛兆光教授、杨志刚教授、李星明教授、芮传明教授。

葛兆光,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曾任清华大学教授。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历史系特聘教授。研究领域为东亚与中国的宗教、思想和文化史。著有《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中国思想史》(两卷本)、《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西潮又东风:晚清民初思想、宗教与学术十论》、《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等,论著曾译成多种外文,并获第一届中国图书奖、第一届长江读书奖、第三届与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等。2009年被聘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第一届“普林斯顿全球学者”(Princeton Global Scholar)。

杨志刚,复旦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博士,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思想文化史、礼学和礼仪制度史、文化遗产和博物馆文化研究等。出版《中国礼仪制度研究》等个人著作多种,校点《东塾读书记》。目前正在推进“孔庙历史与遗产”研究。兼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当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多次获教学成果奖,被评为复旦大学本科生“我心目中的好老师”、复旦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等。

李星明,陕西师范大学文学学士,西安美术学院文学硕士,东南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后。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

向为汉唐艺术史及考古。著有《唐代墓室壁画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主编(合作)《中国陵墓雕塑全集·1·史前至秦代》(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中国陵墓雕塑全集·4·两晋南北朝》(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目前主持8卷本《中国陵墓雕塑全集》(《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的组成部分)的编撰工作。

芮传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研究领域为中外关系史、中亚史。著有《大唐西域记全译(详注)》、《东西纹饰比较》(合著)、《中国与中亚文化交流志》、《古突厥碑铭研究》、《淫祀与迷信——中国古代迷信群体研究》、《东方摩尼教研究》等;译著有《巫术的兴衰》([英]汤玛斯著)、《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法]涂尔干著,合译)、《中亚文明史》第一卷(UNESCO)、《中亚文明史》第二卷(UNESCO,合译)、《上海歹土》(F. Wakeman, Jr. 著)。

“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导师包括文史研究院董少新、许全胜、刘震、孙英刚、朱溢、邓菲、白若思(Rostislav Berezkin)等研究人员。

详细招考流程:请见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网站:
www.gsao.fudan.edu.cn

报名材料寄送地址:200433 上海市邯郸路220号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办公室 肖军

咨询邮箱:xjfd@fudan.edu.cn

电话/传真:021-5566 5284□

文史研究院 2014 年博士后、访问学者招聘启事

◇ 博士后

一、工作站简介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立于 2007 年,是教育部指定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作为文学、历史和哲学研究的一个平台,致力于沟通文、史、哲不同学科的交流与融合,推动世界视野中的中国文化研究,并努力推动各种新文献和新资料的整理。文史研究院以培养高层次人才为己任,设有博士后工作站,接受海内外年轻学人来院继续研究。

二、申请资格

凡在国内外获得博士学位,品学兼优、身体健康,博士毕业年限不超过 2 年,年龄一般在 40 岁以下的优秀青年均可申请。

三、申请材料

(一) 申请者需提供以下材料:(1)本人简历;(2)博士学位证书(复印件)或其他有关的有效证明文件(应届毕业生可先递交申请表,待论文通过答辩后,再

递交论文通过答辩证明或博士学位证书复印件);(3)博士论文全本;(4)硕士、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一览;(5)本人拟在博士后期间从事的研究课题及研究工作计划。

四、研究方向及合作导师

1. 思想史与文化史、亚洲文化与历史研究 葛兆光教授
2. 考古与艺术史 李星明教授
3. 中外关系史、中亚史 芮传明教授

五、截止日期

2014 年上半年:2013 年 11 月 30 日;
2014 年下半年:2013 年 4 月 30 日。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肖军 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200433
电话/传真:021-5566 5284
邮箱:xjfd@fudan.edu.cn



◇ 访问学者

研究方向 东亚跨区域历史研究,中国艺术、思想与文化史研究等。

招聘条件

1. 50 岁以下,具有博士学位,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学术功底;
2. 已在核心或权威期刊上发表过若干篇有创见的学术论文,并出版过专著;
3. 掌握一门以上外语;
4. 具有团队合作精神;
5. 国籍不限,年工作时间 1 个月以上。

招聘范围 国内,国外

应聘程序

1. 提交书面申请材料,包括:a. 复旦大学“985 工

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访问学者申请表,可在我院网站下载;b. 个人简历,含 2 寸报名照一张;c. 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d. 目前任职证明复印件;e. 重要著作和论文复印件,著作有目录和版权页即可,论文则须有发表刊物的封面、目录与正文,两者最好能含被收录引用等情况的说明;f. 重要获奖证明复印件。

2. 研究院根据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并安排面试。
3. 面试通过后报请学校最终决定。

联系人 金秀英

电话/传真 021-5566 5284

材料寄送 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200433

电子邮箱 wsyjy@fudan.edu.cn

截止日期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纪事

(2013.07—2013.09)

• 2013 年 7 月 6 日

葛兆光教授在上海青浦参加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组织的小型会议,讨论 2014 年“上海论坛”的主题。

• 2013 年 7 月 8—9 日

王鑫磊助理研究员参加由中国朝鲜史研究会主办、北京大学历史系承办的“朝鲜半岛的历史发展及与中国的关系——中国朝鲜史学会 2013 年学术年会”,并发表论文《朝鲜时代赴日通信使文献价值的再发现》。

• 2013 年 7 月 8—10 日

葛兆光教授作为特邀讲演嘉宾,赴韩国首尔参加第十三届“亚洲建筑学大会”,发表题为“数与形——古代中国的自然、环境与风景观念”的主题演讲。

• 2013 年 7 月 10—13 日

孙英刚副研究员参加由《学术月刊》杂志社、华东政法大学法律与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古代中国与东亚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黄旗紫盖”与“帝出乎震”——术数语境下的中古政权对立》。

• 2013 年 7 月

朱莉丽助理研究员的论文《从遣明使记录看明朝地方在朝贡制度中的作用——以嘉靖年间宁波对日本贡使的接待为例》刊载在《史林》2013 年第 3 期。

新聘助理研究员段志强博士报到,研究方向为清代思想史与学术史。

• 2013 年 8 月 6—10 日

王鑫磊助理研究员参加由复旦大学历史系、首尔大学历史系、早稻田大学朝鲜文化研究所合作发起,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举办的“东亚青年历史学家暑期研讨班”,发表论文《14—19 世纪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对中国历史研究的价值》。

• 2013 年 8 月 8—18 日

邓菲副研究员赴山西晋城参加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历史系合办的第三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晋城:中国社会的长程历史”。

• 2013 年 8 月 11—15 日

葛兆光教授在北京参加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



员会 2013 年度项目评审会议,并担任召集人。

• 2013 年 8 月 11—15 日

孙英刚副研究员在复旦大学组织召开第一届“国际佛教与中国宗教”国际研究生研讨会,并担任研讨会主持。

• 2013 年 8 月 11—28 日

葛兆光教授在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佛教与中国宗教”国际研修班授课,题为《谁是六祖?》。孙英刚副研究员筹备、组织本次研修班,并讲授《图像、信仰与王权:佛教转轮王与中国中古政治》课程。

• 2013 年 8 月 16—17 日

孙英刚副研究员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陈金华教授共同组织、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神圣的空间与空间的神圣:中古中国宗教中空间因素的构成与展开”国际学术研讨会。

• 2013 年 8 月 18 日

葛兆光教授、杨志刚教授参加 2013 年上海书展之“古籍整理的新方向”讨论会。葛兆光教授作题为《不在场的在场者——李朝朝鲜通信使汉文文献对中国的意义》的主题报告。

• 2013 年 8 月 19—23 日

孙英刚副研究员参加南京大学主办的“经学与中国文献文化”暨第五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隋唐时代的纬学》。

• 2013 年 8 月 22—25 日

孙英刚副研究员参加陕西师范大学和碑林博物馆合办的“第一届中国中古史前沿论坛”,提交论文《庆山还是祇阁崛山:重释〈宝雨经〉与武周政权之关系》,同时担任主持和评议人。

• 2013 年 8 月 24—25 日

朱溢副研究员在日本中央大学参加“第七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并担任梁镇诚《对南朝诏的考察》一文的评议人。

• 2013 年 8 月 30 日

葛兆光教授受台湾中研院长翁启惠的聘任,于 2013—2016 年担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咨询委员会委员。

• 2013 年 8 月

葛兆光教授的论文《由俗而圣:中古道教科仪的宗教化》发表在台湾中研院与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合作出版的《中国史新论》(生活与文化分册)。

• 2013 年 9 月 1—3 日

邓菲副研究员参加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办的“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论文《“昭孝事祖”与“孝感通明”:再论宋金丧葬艺术中孝子图的形式与意义》。

• 2013 年 9 月 5 日

葛兆光教授应邀担任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咨询委员会委员。

• 2013 年 9 月 10 日

法国布列塔尼亚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罗思德(Cedric Laurent)教授来访,董少新研究员、邓菲副研究员接待并商谈合作事宜。

• 2013 年 9 月 14 日

葛兆光教授参加早稻田大学日本古典籍研究所与杭州工商大学东亚文化研究院联合召开的“汉文笔谈:东亚独特的视觉交际方式”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题为《不在场的在场者:朝鲜通信使汉文文献对于中国的意义》的主题演讲。



董少新研究员应邀赴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作题为《葡萄牙耶稣会士何大化与中国》的演讲。

• 2013 年 9 月 15 日

朱溢副研究员在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出席“东亚的礼、仪式和支配秩序”研讨会,并发表论文《北宋宾礼的建立及其变迁》。

• 2013 年 9 月 16—17 日

葛兆光教授在北京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参加“中国人文学中的历史、考据与民族”项目计划会议。该项目是由芝加哥大学纽鲍尔文化社会委员会 (Neubauer Collegium for Culture and Society) 支持,由芝加哥大学苏源熙 (Haun Saussy)、冯珠娣 (Judith Farquhar) 教授与几位中国教授合作的三年期学术交流计划。

• 2013 年 9 月 23 日

我院举办第六十八次小型学术研究会,纽约市立大学历史系教授沈丹森 (Tansen Sen) 作题为《印度的中国研究和中印研究:现状与前景》的报告,孙英刚副研究员主持。

• 2013 年 9 月 25 日

“交错的文化史”工作室举办第二十九次研习班,董少新研究员作题为《明清鼎革之际的澳门》的报告。

• 2013 年 9 月 26 日

杨志刚教授参加华中师范大学举办的“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建设研讨会”,并作交流发言。

• 2013 年 9 月 28 日

董少新研究员参加复旦大学中国文明国际研究中心“闽南话与西班牙语接触研究及其他”深度工作坊,并发表论文“何大化《远方亚洲》所附汉语词汇表”。

• 2013 年 9 月

孙英刚副研究员的论文《“辛酉革命”说与龙朔改革》刊载在《史学月刊》2013 年第 7 期。

严耀中特约研究员的论文《早期佛教与婆罗门教的差异和融合及相关影响》刊载在《宗教学研究》2013 年第 2 期。□

金秀英 整理



2013年9月29日，文史研究院2012级博士生开题报告会在2801会议室举行，4名博士生向5位导师作了开题报告。



2013年8月6—10日，王鑫磊助理研究员（左四）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参加“东亚青年历史学家暑期研讨班”，图为复旦大学代表的合影。



台北利氏学社向我院资料室赠送钟鸣旦、杜鼎克、王仁芳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续编》34册（利氏学社，2013年）。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向我院资料室赠送羽田正编《海から見た歴史》（东京大学出版会，2013年）、池本幸生译《正義のアイデア》（明石书店，2011年）、东文研东亚美术研究组编《中國絵畫總合圖録・三編》（第一卷，东京大学出版会，2013年）。



日本杏雨书屋（大阪）向我院资料室续赠《宋板毛诗正义》第四帙（第35至40卷，2013年6月）。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京都）伊东贵之教授向我院资料室赠送专著《思想としての中国近世》（东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

封面题字 王元化

封面底图 17世纪日本小林谦贞绘《万国总图》

编 辑 杨 琴、肖 军

地 址 上海市邯郸路220号 200433

电话/传真 86-21-5566 5284

邮 箱 wsyjj@fudan.edu.cn

网 站 www.iahs.fudan.edu.cn